

社会支持视角下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CGSS2023的实证分析

李 威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摘 要

本文基于CGSS2023数据, 以60岁及以上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 运用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与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 探究社会支持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并验证抑郁程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分析城乡和婚姻变量下的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 社会支持对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其中正式社会支持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且为正向; 抑郁程度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相较于城市老年女性, 农村老年女性从基本养老保险中获得的主观幸福感提升效应更显著, 无配偶群体的养老保险效应显著高于有配偶群体。值得注意的是, 非正式支持中婚姻状况与社交状态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效应并不显著。因此, 未来推动老年女性积极老龄化, 更需从完善正式社会支持体系入手。

关键词

社会支持, 老年女性, 主观幸福感, 抑郁程度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Wome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23

Wei L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ch 4, 2026; accepted: April 14,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Abstract

Based on CGSS2023 data, this study focuses on elderly women aged 60 and above. It employ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It also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on in this relationship and analyzes group heterogeneity based on urban-rural and marital status variables. The study finds that social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elderly women. Among formal social support, participation in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has a notable and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Depress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mpared to urban elderly women, rural elderly women derive a more pronounced enhancement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from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and the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individuals without a spouse than for those with a spouse. Notably, within informal support, marital status and social engagement do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elderly women'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refore, promoting active ageing among elderly women in the future should primarily focus on improving the formal social support system.

Keywords

Social Support, Elderly Women, Subjective Well-Being, Depres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老年女性作为老龄化群体中的特殊群体，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活困境。相较于男性，老年女性的平均期望寿命更长，患慢性病及因病致残的比例更高[1]；同时，受社会结构与性别差异的影响，老年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源更为有限，这使得其在身心健康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2]，进而产生细腻敏感、情感缺失和收入来源不稳定等问题[3]。研究表明，正式社会支持中养老保险对老年女性的自评健康、身心理健康具有正向影响[4] [5]；非正式支持中社会参与和情感关怀等则会对老年女性的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从社会支持视角出发，探究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不仅能够揭示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体验的内部来源与结构性支撑，也能为破解老年女性发展困境、完善老年女性福利保障体系、推进积极老龄化建设提供实证参考与政策依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文献回顾

1.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最初是由国外学者 Raschke 提出，指个体在人际互动、群体交往与社会联结中，获得他人对自己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认知指导[6]。根据学者们对社会支持理论的完善，可以分为正式非正式社会支持两种，前者指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诸如养老、医疗保障等服务；后者则是亲属朋友等初级群体提供的社交和心理需求[7]。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影响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2. 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身内在标准,对生活质量做出的情感性与认知性综合评价,通常涵盖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三个核心维度[8]。从现有研究来看,影响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呈现出多维度和多层次的特点。个体层面包括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基础性因素,直接影响老年女性的幸福感体验[9];心理层面包括人格特质和抑郁情绪等内在心理因素,通过调节个体认知与情绪状态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10];社会层面包括社会参与度、社区环境等外部因素为老年女性提供幸福感的外部支撑。充足的社会支持,无论是情感支持还是物质支持都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11]。

3. 文献评述

经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学界关于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较为丰富。国内外学者采用问卷调查、现有数据分析等方法,从多个维度探讨了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但现有针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其一,研究视角多依托马斯洛需求理论进行质性分析,缺乏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结论的普适性有待提升;其二,研究内容多聚焦单一类型的社会支持,未对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体系进行系统性分析,难以全面揭示社会支持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三,研究过程中未能充分结合老年女性的生理、心理特质,研究结论的针对性与实践指导性不强。因此,本文以 CGSS2023 微观数据为基础,聚焦 60 岁及以上老年女性群体,系统分析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验证抑郁程度的中介作用,并探究户籍、婚姻状况下的群体异质性,以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完善老年女性社会支持体系提供实证依据。

(二)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和老年女性群体的特殊性以及社会支持理论的思考,研究进一步对最新数据进行验证,尝试提出以下假设。

1.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假设

H1: 正式社会支持会显著提升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

H2: 非正式社会支持也会显著提升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

2. 心理抑郁的中介效应假设

H3: 心理抑郁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3. 城乡与婚姻状况的调节效应假设

H4: 城乡状况在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农村老年女性对社会支持敏感度更高。

H5: 婚姻状况在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调节作用,非在婚老年女性对社会支持依赖性更强。

3. 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3)。原始数据包含 3272 个样本,经剔除变量严重缺失的样本,并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划分标准,将 60 周岁及以上的女性定义为老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筛选得到 1455 个有效样本。

(二) 变量选取

研究依据社会支持理论和现有文献,确定研究变量如下: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对应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3)问卷中问项 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该指标在相关研究中较为普遍,能较好反映个体的整体生活满意度。

2.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支持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首先是正式社会支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商业保险和基本商业养老保险四种，研究中采用虚拟变量处理，若调查对象参与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次是非正式社会支持，研究选取婚姻状况和社交活动两个解释变量，其中婚姻状况若受访者处于已婚或同居状态赋值为 1，否则(包括未婚、离异、丧偶)为 0；社交活动若受访者过去一年曾与朋友聚会或外出娱乐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研究选取老年女性的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对数水平、自评健康为控制变量。

4. 中介变量

为检验社会支持是否通过改善心理健康间接提升幸福感，研究引入抑郁得分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对多个反映抑郁情绪的问项(如“我感到沮丧”、“我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等)进行加总或标准化处理得到，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

5. 调节变量

为考察社会支持效应在不同群体中的异质性，研究以户口差异和婚姻状况作为调节变量，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探究不同的影响因素对社会支持效应的调节作用。

将以上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之后可知，各变量的方差、极值分布合理，无严重异常值，例如：社交活动、婚姻状况的均值分别为 0.62、0.64，表明超六成老年女性参与社交活动、处于有配偶状态；抑郁程度均值为 2.36，表明老年女性的抑郁情绪整体处于轻度水平数据适用于后续实证分析(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variables

表 1. 研究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名称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主观幸福感	3.90	0.91	1.00	5.00
基本养老保险	0.83	0.38	0.00	1.00
基本医疗保险	0.94	0.23	0.00	1.00
基本商业保险	0.08	0.27	0.00	1.00
基本商业养老保险	0.06	0.24	0.00	1.00
社交活动	0.62	0.48	0.00	1.00
婚姻状况	0.64	0.48	0.00	1.00
教育程度	7.46	4.82	0.00	19.00
年收入对数水平	8.13	3.81	0.00	13.82
健康水平	2.95	1.09	1.00	5.00
抑郁情绪	2.36	1.18	1.00	5.00

(三) 研究方法

为系统探究社会支持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群体异质性，本研究采用定量实证分析方法，结合 CGSS2023 微观数据展开检验，具体包括多元线性回归、回归检验以及分组回归的方法。

4. 实证分析

(一)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基准回归分析

研究以主观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将社会支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纳入控制变量后，通过构建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多个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在正式社会支持方面，社会保险及商业保险维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eta = 0.208, p < 0.05$)；在非正式社会支持方面，社交活动(与朋友聚会)和婚姻状况(在婚、有配偶)对主观幸福感均呈现正向影响，但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beta = 0.106$ 、 $\beta = 0.0362$ ， p 均 >0.10)；在健康状况方面，自评健康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beta = 0.181, p < 0.01$)。通过对比发现，健康状况变量的显著效应最强，表明了健康状况是决定居民幸福感的核心要素，健康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

结果表明，假设 H1 “正式社会支持显著提升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 得到验证；假设 H2 “非正式社会支持显著提升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 虽呈现正向影响，但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未得到验证。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2)。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2. 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分析

	主观幸福感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208** (0.0941)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131 (0.154)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0.344** (0.135)
参加商业养老保险	0.239* (0.144)
社交活动(与朋友聚会)	0.106 (0.0688)
在婚(有配偶)	0.0362 (0.0637)
受教育年限	0.00548 (0.00782)
个人年收入对数	0.0139 (0.00876)
自评健康	0.181*** (0.0306)
Constant	3.078*** (0.179)
Observations	1188
R-squared	0.078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二) 心理抑郁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社会支持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以心理抑郁为中介变量，采用中介效应三步法检验社会支持是否会通过改善心理健康水平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

1. 社会支持与抑郁程度的回归分析

将抑郁程度列为因变量、将社会支持及控制变量纳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多个因素对抑郁程度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受教育年限对抑郁程度呈显著负向影响($\beta = -0.0315, p < 0.01$),说明受教育年限越长,老年女性的抑郁程度越低;自评健康对抑郁程度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beta = -0.447, p < 0.01$),表明自我评估健康状况越好,抑郁程度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抑郁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215, p < 0.05$),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抑郁程度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319, p < 0.10$)。这表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女性,其抑郁程度相对较高,这与老年女性对风险感知较为敏感的特质密切相关(见表 3)。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on depression level

表 3. 社会支持对抑郁程度的作用分析

	抑郁程度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215** (0.0968)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319* (0.166)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0.0282 (0.186)
参加商业养老保险	-0.0598 (0.181)
社交活动(与朋友聚会)	-0.124 (0.0776)
在婚(有配偶)	-0.0577 (0.0725)
受教育年限	-0.0315*** (0.00882)
个人年收入对数	-0.0256** (0.00994)
自评健康	-0.447*** (0.0319)
Constant	3.700*** (0.192)
Observations	1186
R-squared	0.252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2. 纳入中介变量后的回归分析

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加入抑郁程度变量后,结果显示抑郁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负向影响($\beta = -0.238, p < 0.01$),即抑郁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在加上抑郁程度变量之后,模型 R^2 由 0.078 提升至 0.146,说明抑郁程度作为中介变量,是影响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间环节,能

够有效解释正式/非正式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部分作用。

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抑郁程度在社会支持与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抑郁的中介作用并非存在于所有变量之间，例如：(1) 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方面显示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208, p < 0.05$)。在对中介变量的回归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抑郁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beta = 0.215, p < 0.05$)。加入中介变量后，直接效应显著且效应量提升，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且效应稳健。

(2) 在婚姻状况方面，总效应与直接效应均不显著($p > 0.05$)，表明婚姻状况对抑郁程度的影响不显著，且婚姻状况未通过抑郁程度影响主观幸福感。

(3) 在受教育年限方面显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不显著($\beta = 0.00548, p > 0.1$)。在对中介变量的回归中，受教育年限对抑郁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eta = -0.0315, p < 0.01$)，表明教育通过降低抑郁程度间接提升幸福感。加入中介变量后，直接效应下降且不显著，表明了受教育年限对幸福感的影响完全通过抑郁程度的中介作用实现。

(4) 在个人年收入对数方面显示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不显著($\beta = 0.0139, p > 0.1$)。在对中介变量的回归中，收入对数对抑郁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eta = -0.0256, p < 0.05$)，表明收入通过降低抑郁程度间接提升幸福感。加入中介变量后，直接效应减小且不显著，也表明了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抑郁程度的完全中介作用实现。

(5) 在自评健康方面显示主观幸福感的效应显著为正($\beta = 0.181, p < 0.01$)，对抑郁程度的负向影响极其显著($\beta = -0.447, p < 0.01$)。加入中介变量后，自评健康对幸福感的直接效应降至 0.0747 ($p < 0.01$)，表明健康对幸福感的影响部分通过抑郁程度的部分中介作用传递。

(6) 在社交活动方面对幸福感的效应均不显著($\beta = 0.0460, p > 0.1$)，表明社交活动表明对主观幸福感无显著影响，不存在中介作用。

综上，可以发现抑郁在自评健康、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对数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其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而在核心社会支持变量(基本养老保险、婚姻、社交、基本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中，中介效应不成立，二者主要以直接作用产生影响。因此，假设 H3 得到部分支持(见表 4)。

Table 4.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表 4.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总效应	对中介变量	直接效应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208** (0.0941)	0.215** (0.0968)	0.259*** (0.0882)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131 (0.154)	0.319* (0.166)	-0.0550 (0.143)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0.344** (0.135)	0.0282 (0.186)	-0.335** (0.139)
参加商业养老保险	0.239* (0.144)	-0.0598 (0.181)	0.225 (0.142)
社交活动(与朋友聚会)	0.106 (0.0688)	-0.124 (0.0776)	0.0738 (0.0662)
在婚(有配偶)	0.0362 (0.0637)	-0.0577 (0.0725)	0.0216 (0.0611)

续表

受教育年限	0.00548 (0.00782)	-0.0315*** (0.00882)	-0.00204 (0.00746)
个人年收入对数	0.0139 (0.00876)	-0.0256** (0.00994)	0.00768 (0.00840)
自评健康	0.181*** (0.0306)	-0.447*** (0.0319)	0.0747** (0.0303)
抑郁程度			-0.238*** (0.0285)
Constant	3.078*** (0.179)	3.700*** (0.192)	3.960*** (0.190)
Observations	1188	1186	1186
R-squared	0.078	0.252	0.146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三) 城乡与婚姻状况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验证社会支持与抑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之后, 本部分进一步检验社会支持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 探索城乡户口和婚姻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具体调节作用。

1. 户籍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从城乡分组回归结果可见, 部分变量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共同影响, 但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例如,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城市居民($\beta = 0.126, p < 0.05$)和农村居民($\beta = 0.385, p < 0.05$)均具有正向影响, 但农村居民效应更大, 说明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其次, 在婚(有配偶)对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beta = -0.0597, p > 0.1$), 对农村居民虽有正向影响但未达到显著水平($\beta = 0.114, p > 0.1$)。笔者也发现, 部分变量在城乡居民之间未产生显著影响或差异较小, 例如社交活动(如与朋友聚会)和个人年收入对数等变量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均未产生显著影响; 而抑郁程度对城市居民($\beta = -0.218, p < 0.01$)和农村居民($\beta = -0.274, p < 0.01$)的幸福感知具有极其显著的负向影响, 且两者的影响程度较为接近(见表 5)。

Table 5.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表 5. 调节效应分析

	城市(N = 746)	农村(N = 390)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126 (0.101)	0.385*** (0.147)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139 (0.181)	-0.182 (0.223)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0.188 (0.135)	-0.948* (0.555)
参加商业养老保险	0.158 (0.155)	0.564** (0.218)
社交活动(与朋友聚会)	0.00982 (0.0784)	0.0785 (0.112)

续表

在婚(有配偶)	-0.0597 (0.0677)	0.114 (0.125)
受教育年限	-0.00280 (0.00879)	-0.0142 (0.0144)
个人年收入对数	0.0118 (0.0104)	0.00211 (0.0142)
自评健康	0.0738** (0.0363)	0.0712 (0.0585)
抑郁程度	-0.218*** (0.0343)	-0.274*** (0.0520)
Constant	3.907*** (0.238)	4.104*** (0.317)
Observations	746	390
R-squared	0.117	0.173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和自评健康是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共同促进因素, 抑郁程度则是共同抑制因素。婚姻状况对城乡差异不明显, 但农村老年女性对正式社会支持(养老保险)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婚姻)的反响更为强烈, 社会支持带来的幸福感提升效应更为突出, 假设 H4 得到验证。

2. 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接着按婚姻分组回归之后, 我们进一步看到有配偶组和无配偶组群体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例如: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有配偶组($\beta = 0.174, p < 0.10$)和无配偶组($\beta = 0.387, p < 0.01$)的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但无配偶组的效应远大于有配偶组, 这表明基本养老保险对无配偶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更为突出, 且抑郁程度对有配偶组($\beta = -0.235, p < 0.01$)和无配偶组($\beta = -0.251, p < 0.01$)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无配偶组的效应量更大, 这也表明抑郁对无配偶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为强烈。并且从数据整体上来看, 无配偶女性更加依赖正式社会支持来弥补非正式支持的缺失。这一结果表明了婚姻状况确实对主观幸福感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非在婚老年女性对社会支持的依赖性更强, 所以假设 H5 得到验证(见表 6)。

Table 6.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表 6. 调节效应分析

	有配偶(N = 756)	无配偶(N = 430)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174 (0.115)	0.387*** (0.135)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0.195 (0.191)	-0.333* (0.197)
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0.256* (0.155)	-0.570** (0.279)
参加商业养老保险	0.220 (0.151)	0.0773 (0.319)

续表

社交活动(与朋友聚会)	0.0392 (0.0831)	0.142 (0.109)
在婚(有配偶)	0 (.)	0 (.)
受教育年限	0.00391 (0.00937)	-0.0149 (0.0119)
个人年收入对数	0.00513 (0.0103)	0.0154 (0.0147)
自评健康	0.0655* (0.0374)	0.0863* (0.0501)
抑郁程度	-0.235*** (0.0361)	-0.251*** (0.0468)
Constant	3.830*** (0.237)	4.103*** (0.276)
Observations	756	430
R-squared	0.138	0.179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5.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CGSS2023 微观数据, 分析了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并探讨了其中的作用机理。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均对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提升作用。在正式社会支持中, 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正向影响显著; 但在非正式社会支持中, 婚姻状况与社交活动的影响未达统计显著水平。第二, 抑郁程度的中介效应具有选择性, 仅在自评健康、个人年收入对数、受教育年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作用, 在核心社会支持变量中未体现中介效应。第三, 农村老年女性从基本养老保险中获得的幸福感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城市群体, 无配偶老年女性的养老保险保障效应显著高于有配偶群体; 抑郁程度对农村、无配偶老年女性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更强, 无配偶老年女性对正式社会支持的依赖性显著高于有配偶群体。第四, 身体健康是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影响因素, 自评健康在基准回归、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中均呈显著正向影响, 且效应量位居前列, 表明身体健康是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基础与核心。

从分析结果来看, 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明显强于城市老年女性, 且无配偶群体对基本养老保险的需求更为迫切。所以, 要提升老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 需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等正式保障制度, 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保障水平, 尤其要向农村老年女性倾斜; 二是常态化关心老年女性的身体健康, 重点关注无配偶、低收入等老年女性群体, 通过降低抑郁程度间接提升其幸福感; 三是兼顾群体差异, 例如积极引导无配偶老年女性参与社交活动, 培育多元非正式支持渠道, 在此过程中强化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互补作用。

参考文献

- [1] 朱宇航, 郭继志, 李敏, 等. 城市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6, 29(4): 674-677.

-
- [2] 吴雪雨, 巢健茜, 鲍敏, 等. 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性别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22, 23(1): 13-19.
 - [3] 殷萌, 沈力, 操文聪, 等. 中国老年女性心理健康状况潜在剖面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25, 42(6): 726-730.
 - [4] 黄中燕. 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女性健康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东财经大学, 2024.
 - [5] 魏强, 苏寒云, 吕静, 等. 家庭规模、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对农村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西北人口, 2020, 41(5): 106-115.
 - [6] 皮芑, 孙宏亮.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农村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路径探析[J]. 中阿科技论坛(中英文), 2024(7): 40-44.
 - [7] 杨梅, 刘红, 田丹. 老年女性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7, 25(7): 1108-1112.
 - [8] Sawamura, H., Shima, K. and Tanji, J. (2002)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for Action in the Parietal Cortex of the Monkey. *Nature*, **415**, 918-922. <https://doi.org/10.1038/415918a>
 - [9] 徐涛, 王晓玲, 朱英伟. 东北秧歌体育锻炼对老年女性人群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4(5): 157-158.
 - [10] 方必基, 龚茜, 刘彩霞, 等. 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黑龙江科学, 2014, 5(11): 146.
 - [11] 张丽萍, 朱海燕. 中国女性丧偶老人基本状况及其主观幸福感研究[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8(5): 88-97.